

当代 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IV

黄卫平 汪永成 主编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编

● 主编 / 黄卫平 汪永成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IV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构建和谐社会： 深入完善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代前言)

黄卫平 谢振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共十六大以来的一个全新执政理念。十六大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曾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奋斗目标，这在历次党代会上尚属首次。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并明确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涵。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①这对党在新时期进一步完善执政的政治基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特定视角来解读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有必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党为巩固执政基础所做出的努力。

^① 《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

一 邓小平全面提高了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创始之际，只是一个拥有几十名党员的小党。历经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通过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终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由此工人阶级获得了国家法定的领导阶级地位，工农联盟也成为国家法定的阶级基础。无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是中国共产党传统的阶级基础。

然而，由于建国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以领袖的个人权威和极“左”的意识形态作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毛泽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曾周而复始地多次发动政治运动，结果事与愿违，不仅严重地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且导致“文革”后期，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使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人民群众中自发地反对“文革”的抗议活动和对所谓“四人帮”的不满情绪日益蔓延。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向何处去？使党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抉择，党内的健康力量毅然决然地粉碎“四人帮”，又经历了两年的徘徊后，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的邓小平被重新恢复了在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职务，从此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这是党顺应民意的自我改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毋庸讳言，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及十年“文革”使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遭受严重的影响，以领袖个人的克里斯玛

型（charismatic）权威以及极“左”意识形态作为主要来源的合法性基础，随着“四人帮”的被捕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而逐渐动摇。因此，重塑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就成为“文革”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的首要任务。亨廷顿认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权威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①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则是重新建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治自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意味着执政党开始选择用政治体系的经济绩效来取代意识形态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此后的约二十年内，经济发展一直是党执政的合法性的主要源泉。^②

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尽快满足人民群众在多年“文革”的极“左”灾难后，对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才能真正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因此，他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改变了毛泽东一度主要靠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来巩固政权的习惯思路，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必须通过发展经济，给人民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的现实政绩，来换取民众支持的执政理念，强调通过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来重新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认为“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的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③正如利普塞特所指出的，“长期保持效率

① 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版，第59页。

② 张健：《合法性与中国政治》，《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王孝鸣、黄卫平：《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86页。

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在现代世界，这种效率主要意味着不断的经济发展。”^①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束缚，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壁垒，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党也在城市中逐步探索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尝试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特区，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从而不断改善了人民生活，提高了综合国力，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使党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一关我们闯不过……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②可以说，正是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极大地解放了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束缚的社会生产力，不仅在“崩溃边缘”挽救了中国经济，而且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从而全面提高了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二 江泽民广泛拓展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有效性为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而保证了整个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但是，单纯依赖经济增长的这种政绩型合法性基础是有一定时效性和局限性的，因为一旦经济不能保持长

① 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5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1页。

期高速增长，或者经济发展导致巨大的财富分配差距，这时就会产生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困局”^①。利普塞特在阐述经济绩效与合法性的关系时指出：“一般来说，即使一种政治制度具有合理的有效性，如果在任何时候主要保守群体的地位受到威胁，或在关键时刻新兴群体被剥夺参与政治的机会，该制度的合法性仍将成为问题。另一方面，一再地或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也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②也就是说有效性可能带来合法性，但并不必然带来合法性，仅仅以政绩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是一种不稳定的合法性来源。因此，20世纪90年代末，党一方面坚持将经济发展作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也在通过“依法治国”、发展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等一系列举措以重新塑造自己的法理制度型合法性基础。

邓小平时代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行非均衡的梯度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分配领域的理性表述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此，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政策，也从毛泽东时代的限制和改造，逐渐地变成宽容和鼓励，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据统计，截至1999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已达到150.89万户，个体工商户3160.06万户，两者从业人员超过8000万人。非公有制企业注册资本金达到1.35万亿，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5%，而个体、私营经济年增长速度超过20%，年均增加600万个工作岗位。^③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壮大，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

① 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版，第59页。

② 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第56页。

③ 张志勇：《确立经济地位的27年——中国非公经济发展备忘录》，《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3月11日。

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的产生促使传统政治生态的改变，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逐步增长，新的经济力量和社会阶层开始要求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利普塞特在论述合法性危机时曾指出，如果国家处理“参与政治”危机——关于新社会群体何时有权参与政治过程的决定——不当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失去合法性。^① 因此，如何看待私营企业等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被消灭的经济成分，如何看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阶层，是把他们看成是异己力量，还是把他们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体制中来，关系到执政党能否处理好因新的社会群体的产生而可能出现的政治参与危机，这对能否有效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大影响，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

20 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我国社会转型日趋加速，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迅速分化，制约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更加复杂，新兴社会阶层的能量不断增长，政治腐败也有加剧的趋势，这些都在不断地挑战执政党多年来一直以经济发展作为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思路。面临各种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为了使党能够在 21 世纪“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② 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党面对新时代重新塑造和巩固

^① 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第 55 页。

^② 《人民日报》，2000 年 2 月 26 日第一版。

执政合法性基础作出的全新的尝试。“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特别是党从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出发，为进一步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和代表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明确承认了在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社会阶层的合法政治地位，并通过修改党章，肯定了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包括私营企业主）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广泛拓展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社会阶层“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党首次明确肯定私营企业主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被取缔、改造，到改革开放初成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从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私营企业主阶层从在传统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非法地位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是党对新时期执政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的新认识。

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

^①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的贡献。”^① 在党的传统意识形态中往往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作为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一个重要标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主要是依据人们占有财产的多寡来划分阶级并对其政治态度进行分析的。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观念风行了整个社会。十六大报告的上述论述极大地冲击了长期以来人们对财富及财富占有者的恐惧甚至仇视心理，解除了对改革开放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顾虑，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营造了“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标志着党决心“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②

在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正式承认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只要符合条件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党的十六大上就已有私营企业主身份的正式代表，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利普塞特认为“每当新群体在政治上活跃时，容易进入合法的政治机构，往往可赢得新群体对制度的效忠，”^③“如果新阶层除革命以外就无获得权力的可能……就阻碍了合法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662页。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662页。

③ 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第55页。

性的增长。”^①可以说，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正努力通过将社会上各个新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来，以尽可能避免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具有政治潜力的社会阶层从体制外寻求利益表达。从这个意义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泛拓展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三 胡锦涛深入完善着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利益格局也进一步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重组，阶层间、行业间、地区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社会冲突时有发生，这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正是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为了重新整合党执政的传统阶级基础，深入完善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及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胡锦涛在解释这一目标时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②这一界定，将民主法治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内涵，而公平正义紧随其后，令人耳目一新。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新一届党中央的全新执政理念，从两个方面为深入完善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第一，以民主法治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内涵，深刻表明了执政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自从中共十四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高决策层为了既避免党内极“左”习惯势力的阻挠，又防止海内外敌对势力借题发挥；

① 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第55页。

② 《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

既保持政治稳定，以利于经济发展，又能够渐进地、理性地推进政治改革，而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压力与挑战面前，采取了一种具有极高政治智慧的战略选择——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融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体制改革之内。^①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面临着全新的执政环境，出于相似的考虑，同样以极高的政治智慧，采取了一种将我国政治改革的具体内容，通过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来实现的战略选择，即将政治改革的重点放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方面，又将政治改革的内容寓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当中。同时，将民主法治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选项，表明执政党将把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建筑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普世价值——民主和法治的基石之上，这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民主为先，因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社会各方面利益得到妥善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的社会。而在当前，由于社会利益分化加剧，人民群众实际上是分成不同利益群体的，其具体利益要求往往不尽相同，而满足各不同利益群体需求的各种资源在客观上是有限的，满足了某一部分群众的某种具体要求，就可能无法完全满足另一部分群众的某种具体要求，在排除了用暴力和强权来分配利益的机制后，人类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创造的政治文明，就要求建立现代民主政体，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设计与安排，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和尊重少数的原则，来规范利益表达和协调利益分配，使执政党和公共权力机关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能够顺应大多数民意。因此，党中央将民主法治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内涵，要求党不断改革和完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提高代表民意和整合利益的能力，真正做到“民主执政”，最广泛最充分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① 黄卫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谈》，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28页。

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而从根本上巩固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法治作保障，因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宪法和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公正、人权得到保障的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深刻总结历史教训而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建设法治国家，必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必须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注重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通过立法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利，以法治来保障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唯此才能构建一个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执政党也只有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依法执政”，保障社会公正，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第二，将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意在重新整合党的阶级基础。工人、农民是党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基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调整 and 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事实上不同程度地作出了许多牺牲，并有逐渐边缘化的趋势。因国有企业改制所造成的大批下岗职工，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形成的农民工群体，以及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广大农民，已经成为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这种状况如果长期不能缓解，势必使党执政依靠的政治资源流失，从而动摇党执政的基础。因此，胡锦涛特别强调：“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① 公平正义作为和

^① 《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第一版。

谐社会的重要内涵，是党中央在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分配原则，坚持初次分配讲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二次分配讲公平，尽可能地通过财政、税收等方式帮助和扶持弱势群体，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能够在新时期继续巩固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阶级基础。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①“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②公正也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价值和基本取向，胡锦涛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③因此，与时俱进，适时地调整公共政策，把公平正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④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不断深入完善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重要举措。

综上所述，邓小平通过启动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从而全面提高了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江泽民通过给予市场经济中迅速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以合法、平等的政治地位，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广泛拓展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通过加强党的

①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页。

②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页。

③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讯》，2005年第3期，第20页。

④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讯》，2005年第3期，第21页。

执政能力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意在重新整合和加强党的阶级基础，而且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内涵，正在进一步深入完善党执政的现代政治基础。这一切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顺应时代发展，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从而与时俱进地在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过程中，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执政基础。

（黄卫平：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谢振才：深圳大学 2003 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目 录

构建和谐社会：深入完善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代前言） 黄卫平 谢振才 / 1

全球化与中国的政府能力 俞可平 / 1

紧紧抓住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强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 黄宗良 / 43

简论我们党对执政能力建设的积极探索 张阳升 / 51

关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改革的若干思考

..... “党的执政方式研究” 课题组 / 62

简论执政成本 王长江 / 77

论政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政治解读

..... 黄卫平 李 平 / 85

论强有力政党的特征和建设途径 张 涛 / 102

基于政治认同的执政能力建设 程 浩 / 113

党内批评功能的变化及影响 宋 涛 / 124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基于新加坡经验的

分析 吕元礼 / 140

中国政治改革政策的目标设定和策略选择	徐湘林 / 156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意义及其发展完善	谭君久 / 169
论 21 世纪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	徐 勇 / 192
论构建我国完善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	周 平 / 210
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竞争性民主”与 “协商性民主”	黄卫平 陈 文 / 228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当代中国主题	
——社会转型及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	商红日 / 248
论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杨海蛟 / 259
基于人权视角的政治文明解读	邹平学 / 278
商议式民主与中国的地方经验：浙江省温岭市的 “民主恳谈会”	郎友兴 / 299
城市业主维权运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邹树彬 / 318
2003 年深圳、北京人大代表竞选的行为主义分析	曹 健 全天赐 / 334
公共管理：政治学的视域	王乐夫 / 349
西方理性官僚制与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取向	张定淮 黄国平 / 364
公用事业市场化政策潜在的公共风险及其控制 对策研究	汪永成 / 378
论邓小平对香港特区管治方式的设想 ...	张定淮 涂春光 / 402
后 记	/ 416